

参加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

1988年9月·太原

初论清代扬州学派
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

赵苇航

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

一九八八年八月

初论清代扬州学派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

赵 苇 航

有清一代，考据之学成就辉煌，一时名家辈出，形成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一代思潮。梁启超说：“我国自秦以后，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，则汉之经学，隋唐之佛学，宋及明之理学，清之考证学，四者而已。”①

“扬州学派”，是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分支。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，兴化任大椿，江都汪中，甘泉焦循，仪征阮元，刘文淇、宝应刘宝楠等，是其杰出代表。他们遵循戴震“必由字以通其辞，由辞以通其道”之教，重视掌握语言文字，重视对典章制度、天文、历算、历史、地理等领域的研究，所以功底坚实，知识宽广，开创了一代治学之风气。张舜徽指出：“余尝考论清代学术，以为吴学最专，徽学最精，扬州之学最通。无吴、皖之专精，则清学不能盛；无扬州之通学，则清学不能大。”②他还强调说，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“创”，象焦循的研究《易经》是前无古人，自创新例；其次在于能“通”，如汪中的辨明学术源流，是融会贯通；刘文淇的研究《左传》，刘宝楠的研究《论语》，都有显著的成绩。的确如此，扬州学者兼具创新和通博的治学特色，均能扩展治学范围，遍及四部，走上“通核”之途。

清代扬州学派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，其中不少学者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，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。如汪中的《广陵通典》、《述学》、《金陵地图考》；焦循的《邶记》，《北湖小

是。《扬州足征录》、《诗地理释》、《论语地理考》；刘文淇的《扬州水道记》、《重修仪征县志》、《楚汉诸侯疆域志》、《江都县志》、《江都县志校勘记》；刘宝楠的《宝应图经》、《宝应文征》等著作，均为与历史地理学有关的重要文献，值得我们进行研究。本文仅对《述学·广陵曲江证》、《北湖小志》、《扬州水道记》和《宝应图经》，略作初步的探讨。

一、汪中对广陵涛的研究

汪中，字容甫，江都人。生于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卒于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。汪中的治学，是遵循顾炎武的道路前进的。他自己说过：“中少时同学，与私淑诸顾宁人处士。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，及为考古之学，惟实事求是，不尚墨守。”③汪中治学范围比较广泛，对于经学、史学以及周秦诸子的钻研，很有功力，从汪氏对广陵涛的研究，即体现出他“实事求是，不尚墨守”的治学态度。

“广陵涛”是个有名的历史地理问题。“广陵曲江有涛”，是历史上一个很有价值的记载，对于长江古河口、古潮汐现象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。自从西汉枚乘写了著名词赋《七发》以后，二千年来，广陵涛一直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反复争论的问题。枚乘以华美的词藻记述了广陵涛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及其宏伟景象。文中写道：

客曰：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，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。至则未见涛之形也，徒观水力之所到，则恤然足以骇矣！观其所驾轶者，所濯拔者，所扬汨者，所温

汾者。所涤汽者……波涌而涛起。其始起也。洪淋淋焉。若白鹭之下翔；其少进也，浩浩澄澄，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。其波涌而云乱，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……④

由此观之，广陵涛是涌潮。但是，这汹涌疾驰、怒吼如雷的潮水究竟在哪里呢？东汉王充曰：“广陵曲江有涛。文人赋之：大江浩洋。曲江有涛，竟以隘狭也。”⑤这段话常被人引用证明汉代扬州有涛。然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误引《七发》之曲江入“浙江水”，其后遂有广陵之曲江即浙江（钱塘江）之说。后代不少学者就把广陵涛与钱塘潮混同起来了。清初学者毛奇龄、朱彝尊都持广陵曲江即钱塘江的说法。《朱彝尊文集》三十一卷有详细叙述。

汪中的《广陵曲江证》⑥指出了酈氏的疏误，比较全面地论证了广陵曲江即扬州一带的长江河段。文中说：“曲江之为北江，非孤证矣。……浙江篇注据《吴越春秋》以《七发》所云专属之浙江则误矣。”“广陵城本在蜀冈上，邗沟环其东南，江即在其外，……其时江犹至于扬子桥，而东关以外即江浒也。……广陵涛固非无据也。”文章最后以“恐后人习谬而不知，故为正之”而结束，可谓有力强调，曲江即长江扬州附近河道。汪中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。“曲江之为北江”，就明显反映出长江镇扬河段的分汊河道的特性。所谓“北江”，就是长江北支分汊河道。汪氏的解说，是符合汉代长江河口段的河道形势的。

扬州古名广陵。早在二、三千年前，它与镇江南北相对，扼守长江口，长江北岸直逼广陵城下。当时扬州附近的江岸，位于今扬州城西北约四公里的蜀冈前沿，当时长江口喇叭湾的顶点，在今仪

征附近。春秋时修筑的邗城、战国楚广陵城和汉代的广陵城，都设在蜀冈之上。

春秋时代，在蜀冈之下淤出了一片滩地。为了沟通广陵达江的航道，春秋吴国即在蜀冈之下开凿了邗沟。汉代，蜀冈下的滩地，又有所发展，使汉武帝有可能在元狩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于广陵城西南四十六里远的地方建立江都故城⑦，其位置大约就在距今仪征不远的滩地上。但当时河床开阔，涌潮不断发生，加上江流摆动冲刷，江都故城建立后不久，即在三国时圯入江中。⑧

汉晋时长江口离扬州并不远，汉初海陵（今泰州）有江海会祠，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云：“江海会者，谓江入海处也。”所以这一带涌潮十分壮观，“北固望海，广陵观涛”是汉晋时流行的佳话。广陵涛是汉时长江口内的涌潮现象，随着江口的东移，至唐代中叶才逐渐消失。汉时长江口在扬州至泰州一带，河口段近似一喇叭形，喇叭口朝东北方向，这是形成广陵涛的有利条件。喇叭形河口，向下展宽，向上束狭，由利于潮波在上溯传播过程中愈上愈强，加上曲江水浅，海潮从开阔的海湾进入河口浅隘处，潮波就容易破裂而形成涌潮。现在长江口主要涌潮区在南通以下，强涌潮区主要发生在海门以下的河口段。自海门以上，涌潮显著减弱，至镇江的平均潮差已不到一米（0.92米）。海门以下的涌潮，以崇明岛北面的汉道潮差最大，崇明岛南面的汉道潮差较小，这与广陵涛发生在长江的北支汉道——曲江（北江），也是完全一致的。由此也可得知，“广陵曲江有涛”指的就是长江的北汉。现在长江口的涌潮主要发生在洪水季节，八、九月份的潮差通常是全年最大的。这

与枚乘所记“将以八月之望，观涛乎广陵之曲江”，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。无疑，广陵涛确是汉时扬州江口段的一种涌潮。世界诸大河的河口段，都有河道弯曲或分汉的特征。扬州地区长江水道正是以这种弯曲河道的形式发展的。江中布有江心洲（或河口沙坝），使河道分汉，水流分成两股，绕行江心洲两侧。顺直河道变为弯曲。前人把洲北的汉道称为北江，或北港；洲南的汉道称为南江，或南港。唐时形成的小江（长江北支分汉河道），宋以后形成的夹江，都呈弧形弯曲；现在和畅洲的北支汉道，也呈弧形弯曲。历史演变的遗迹证实，镇扬河段具有分汉弯曲的特性，“曲江”就是这种特性的产物。

扬州城东近郊小东庄曾出土唐人墓志《唐故清河张君墓志》，上载：“……即以其（元和五）年五月九日卜葬扬子县曲江乡东五乍村之原。”确证唐时扬州有曲江之地。估计汉时曲江不会离此太远，广陵涛就可能出现在这一带。从当时的河势看，曲江应该是长江江心洲引起的一个北支分汉河道，这个江心洲有可能就是开沙的前身。汪中的论断：“曲江之为北江”，也证实了这一江流的特征。南江即南支汉道，当在今镇江附近，涌潮主要发生在长江北汉，所以江都故城才有被江水浸吞的可能。汪氏的《广陵曲江证》，对《七发》中所述太子观涛，还有一段论证：“走时，吴王渚都广陵。北江在国门之外。故强太子往观之。若跨越江、湖千二百里，以至浙江，则病未能也。”意思是吴太子病重，客人要求太子去观涛以散心治病。如果广陵涛是钱塘潮的话，那么要病中太子跨越江、湖一千二百里去浙江观涛，怎么可能呢？只有广陵涛就在国门之外的

长江，才合情合理。

清代学者梁章钜、李慈铭等人均赞同汪中的曲江在扬州的观点。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云：“连日见阎若璩撰《潜邱札记》。七发广陵观涛之为今扬州江都地，汪容甫之说甚确，无以易之。阎氏亦以曲江为钱塘江，同竹宅之说，已为非是。至云汉景帝时会稽郡省并入江都国，则大误矣。”

综上所述，广陵涛发生在长江扬州河段是无可置疑的。汪氏的《广陵曲江证》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
二、焦循对地方志的研究

焦循，字理堂，一字里堂。生于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卒于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。世居江都黄珏桥。雍正九年，分县为甘泉人。焦循不仅博通群经，在地方志编纂方面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。

嘉庆十年，伊秉绶来任扬州知府，那时阮元正丁忧在家，倡议整理扬州文献，聘焦循纂修《扬州图经》、《扬州文粹》两书。伊氏“所颁体例，仅用纂录，不另一字，而标以出处”，以示文献足征。焦氏反对用纂录体，认为这不符合修地方志的体例，寄书争辨说：“此诚取信于古，恐有凿空诬伪之病也。……前此雍正府志、甘泉县志，体例杂糅，颇堪哂笑。……纂录之书，最忌挂一漏万。”⑨并陈述十点理由，予以辨正。他提出了“按事立格，依文树义”的修志主张。在编述原则上，焦氏强调详近略远，详近，便必以闻见为本，以实地调查为依据。他说：“郡志为土地之书，宜先释地。为嘉庆十二年之郡志，则嘉庆十二年见在之城郭、河渠、

郡里、疆域，以及寺观、桥梁、田赋、户口，皆目验而知。实莫实于此矣，是必按而记之。书其实迹，不厌于详，不嫌于琐，是为所见异辞也。”⑩焦氏对志书的纲目十分重视。他在《上郡守伊公书》的末尾拟出目录为：“南巡纪、恩泽纪；总图、四境保甲图、水道图、江洲图、廨宇图；氏族表、选举表、职官表；地理略、河渠略、盐策略、漕运略、政略、军事略、金石略、艺文略、户口略、田赋略；列传；沿革考、古迹考。”这篇志书的纲目，在体例上，地文、人文、艺文三者齐全；体裁上，图、表、志（略）、纪、传五者俱备，在当时是比较完备的。

嘉庆十四年，焦循又佐扬州知府姚文田（秋农）纂修《扬州府志》，也提出不少合理建议。如关于志书的内容问题，姚文田写信给焦循，认为志书中“诏令奏疏之类概不录，以省烦冗，择其要者入艺文。”焦氏复函道：“志书以诗文为艺文，最是陋习。……窃谓文与诗，必有关于事实者，随类取入，如沟洫志载贾让三策，礼乐志载房中诸歌也。其有关古迹者，必如文文山之贾家庄、鲇鱼坝诸作。迹见于诗，诗即是证，若偶然游眺行吟，无关情事，虽杜少陵，苏东坡亦宜在禁例，所以防烦冗也。奏疏之文，一生精血，莫要于此。”⑪当时修志流派主要有以戴震为首的“考据派”和以章学诚为首的“历史派”。伊秉绶主张的编纂方式本于戴震。戴氏久寓扬州，给扬州学者以很大影响。焦循一生最推崇戴学，但在志书的古今、详略问题上却不同于戴氏。焦氏这种不泥古、不唯上的治学精神是可贵的，能对地方长官提出不同见解，也是不容易的。

焦循在嘉庆十二年撰写成《北湖小志》一书。“扬州之运河，

自宝应黄浦入界，至瓜洲，仪征达于江。河以东曰下河，河以西曰上河。上河皆湖也。其在甘泉境者，鄙人谓之北湖。东束于运堤，西受西山诸水，北受高邮湖水，方三十里。而滩隈阨阜，错落其中，若爪若角，若木之交枝，非生长其间，往往迷其境焉。”⑫焦氏世居其地，运用他的修志理论，整理旧闻，搜访遗著，又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研究而写成的《北湖小志》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该书给我们留下了邵伯湖以南地区的宝贵的历史地理资料。全书六卷，共47篇。其中，《叙》六篇：《叙水》、《叙地》，详细介绍了湖荡、水系等地理件条件；《叙农》、《叙渔》，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北湖农村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。水乡风貌和湖上捕鱼技法以及捕蟹、取虾、捉野鸭、水鸟之法，跃然纸上。《记》十篇，专载名胜古迹，如开元寺、梓潼祠、锥坝、黄珏桥东岳庙、沙香洲、珠湖草堂、六湖等。《六湖记》考证了邵伯湖、黄子湖、赤岸湖、朱家湖、白茆湖和新城湖的位置和演变。《传》二十一篇，专载重要人物。如《孙柳庭传》，就很值得注意。孙兰（字滋九，自号柳庭）是明末清初具有先进思想的地理学家，他的家乡是扬州府郭的江都县。他青年时代遭到国变，特别是清兵对扬州的屠戮，给他很大刺激。晚年隐居北湖。侯仁之先生在其《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》中提到过孙兰。《书》八篇，专载奇闻轶事。《家述》二篇，专载焦氏世系大事。阮元替《北湖小志》作序，称焦循“学识精博，著作等身。此书数卷，足覩史才。”

三、刘文淇《扬州水道记》的历史地理学价值

刘文淇，字孟瞻，仪征人。生于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，

卒于咸丰四年（1854）。刘氏家境贫寒，一生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教书生涯中，其次便是帮人校勘古籍。他替阮元校勘过宋元本《镇江府志》，写成校勘记四卷，还校勘过《旧唐书》和《舆地纪胜》等书。他曾应地方官之邀，担任过重修《仪征县志》的总纂。《扬州水道记》也是刘氏的力作，1838年写成。

1845年刊印。全书四卷，图一卷。第一、二卷为江都运河，第三卷为高邮运河，第四卷为宝应运河。研究的运河河段南起瓜洲，北至宝应黄浦。全书一开始就写道：

春秋之时，江淮不通，吴始城邗，沟通江淮。此扬州运河之权舆也。于邗筑城穿沟，后世因名之曰邗沟。一曰邗江，而由江达淮，皆统谓之邗沟。唐宋以前，扬州地势南高北下，且东西两岸未设堤防，与今运河形势迥不相同。若以今日之运河，求当年沟通之故道，失之远矣。今博稽载籍，详加考证，凡有沿革，具著于篇。

确实，作者是博取典籍详加考证的。刘氏“检书几及万卷，方事编辑”。对邗沟故道之考证至为详尽，这对于研究运河水利史是很有价值的。大运河的形成与演变，是中国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。扬州运河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本书就具有较大的历史地理学价值。正因为如此，马正林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理简论》一书所附的“参考书目”中也列有《扬州水道记》，编者说：“这些参考书实际上是学习中国历史地理的必读书”。《扬州水道记》不仅探讨了扬州运河本身的沿革和变迁，而且还涉及运河两岸的工程和两岸的诸湖，内容是相当丰富的。本文仅就刘文淇对平津堰的

见解作一些评述。

“平津堰”是唐代淮扬运河上一项著名水利工程。是由李吉甫修筑的。据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记载：李吉甫在元和三年九月至六年正月任淮南节度使时，曾因“漕渠卑下，不能居水，乃筑堤堰，以防不足，泄有余，名曰平津堰”。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也有类似记载：“初，扬州疏太子港、陈登塘，凡三十四陂，以益漕河，辄复壅塞。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浚渠蜀冈，疏勾城湖、爱敬陂，起堤贯城，以通大舟。河益卑，水下走淮。夏则舟不得前，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，以泄有余，防不足，漕流遂通。”但是，平津堰究竟是何种水工设施？究竟在何处？众说纷纭。宋代祝穆的《方輿胜览》以为平津堰在高邮境内是李吉甫筑以溉田之用。但尚未认为是运堤。明代李春芳《东堤成碑记》认为平津堰是高邮的运堤。《明史·河渠志》认为平津堰是高邮之捍堤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谓宝应运河堤自黄浦至界首长八十里，即平津堰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谓高邮运河故址即李吉甫所筑之平津堰。雍正《江都县志》谓平津堰即运河堤，又名漕河堤。乾隆《高邮州志》云：“唐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虑漕渠卑下不能居水，乃筑堤名曰平津堰，即官河堤”。而刘文淇认为，平津堰既然是针对“水下走淮”而修，应是运河上的拦河堰埭。

唐之漕运，高邮、宝应一带皆由湖运，实未尝有湖堤。据周魁一研究^③，宋代以前，淮扬运河穿行于沿岸众多湖泊之间，运河两岸并没有系统的堤防。但因运河穿行于湖泊之中，湖面宽广，风浪较大，航运安全缺乏保障，于是从北宋起，淮扬运河开始修建系统

堤防。淮扬运河早期的修堤记载见于北宋景德年间，高邮新开湖首先筑堤。当年的江淮发运使李溥有鉴于新开湖多风涛，令漕舟东下者，在泗州装载石料，运至新开湖，积为长堤。自是舟行无患。随后，继任江淮发运使的张纶，继续在高邮以北修建运河堤二百里，从此高邮以北运河遂和沿岸诸湖分离开来。刘文淇认为“平津堰者，平水堰也。”“平水堰施于水中，吉甫之平津堰亦拦河置堰也。置堰于河中，使上下之水得其平，水不得下走，有余始泄之，故谓之平津堰。水平则无流。李习之《来南录》云：自邵伯至江九十里，渠有高下，水皆不流。渠既有高下，而水皆不流者，有堰以平之也。是平津堰之置在河中，断无疑义。”刘氏又曰：“食货志叙李吉甫筑平津堰，先言扬州疏太子港、陈登塘（俱在仪征）以益漕河，辄复塞；次言杜亚疏勾城湖、受敬陂，起堤贯城，河益卑，水下走淮，则平津堰必在江都、仪征境内。平津堰者，平水堰也。先是漕河无堤，杜亚始起堤贯城，堤益高，故河益卑，水无节制，闸一启放，水即下走，故扬州之漕河时复壅塞。”刘氏还指出，平津堰之作用是平漕河之水，亦非止一处。最后，刘文淇强调说：“统观唐代扬州水利，唯有筑塘以蓄水，开渠以行水，设堰以节水。其时止患水少，不思水多。杜亚所筑之堤专为籍塘济运而设，至高、宝皆由湖运，无事堤防。而志书以扬州运堤始于李吉甫，且谓吉甫之平津堰即江都、高宝之运堤，胥失之矣！”笔者赞同刘氏之说。

四、刘宝楠《宝应图经》的历史地理学价值

刘宝楠，字楚桢，宝应人。生于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卒于咸丰五年（1855）。少年时期，已与仪征刘文淇齐名，人

称扬州二刘”。刘氏的《宝应图经》，是一部私纂的宝应地方志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一书中对它有高度评价。刘宝楠之子刘恭冕作“书后”，略云：

家君著《宝应图经》六卷，始于嘉庆己巳，成于道光癸未。自汉唐以来，城邑之沿革，湖河之变迁，漕运之通塞，与夫民生利病所可考而知焉者，无不瞭如指掌。至谓邗沟，山阳渚于扬州、淮安两郡为统名，非邗沟专属江都，山阳渚专属淮安；扬州运堤非李吉甫所筑平津堰，而扬州地势，唐宋以前南高北下，邗沟水北流入淮，以故自昔江淮之间止患水少，不患水多。至蓄高堰，内水始南流入江。皆至详确，无所复疑者也。

这段话很中肯。确实，城邑之沿革，湖河之变迁，漕运之通塞，均为书中重要内容。这些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。《宝应图经》与官修的康熙《宝应县志》、道光《宝应县志》相比较，卷数和纲目内容少一些，但在城邑、疆域、河渠、水利诸方面的论述，比官修县志要详细、深入得多。因此民国二十一年编撰的《宝应县志》，引用《宝应图经》多处。官修的《宝应县志》，一般只是照搬、抄录前志及别的文献的资料，并没有对前志的疏误提出疑问或探讨。而《宝应图经》却能对前志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不论是正史还是名人名书，认为有问题，刘氏就与之进行辩论，这种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。作者对射阳城的位置、东阳县的东境、“八浅”地名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证，令人信服。兹逐一介绍如下：

关于射阳城的位置。宝应县历史悠久，肇始于汉。汉置射阳县、

平安县、东阳县。射阳城即射阳县治所在，弄清它的正确位置，至关重要。刘宝楠按：射阳城旧有二说，皆在今宝应境。酈道元《水经·淮水注》云：「中渚水」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，径山阳城西，即射阳县之故城也。应劭曰：「在射水之阳」。酈氏认为射阳城在白马湖侧，城既临湖，是在县北十五里。清代学者胡渭的《禹贡锥指》、傅泽洪的《行水金鉴》皆用酈氏说，而误会其旨，则云射阳城在山阳东南。酈氏之误本于应氏，胡氏之误本于酈氏，傅氏直用胡氏之说。刘宝楠又追根求源，查出酈氏所引应氏之说在《汉书》志注。应劭注《汉书》，据水北曰阳之例，凡地兼水名则曰某水之阳，其说不通。惟射阳有射阳湖，因傅会为射水之阳。夫射水《水经》及诸史无明文射阳县为射水之阳之县。酈氏上言白马湖，下引应劭曰在射水之阳，似谓白马湖即射水，甚误更甚于应氏。刘氏同意并引证阎若璩、严观、乔莱等人关于射阳故城在楚州安宜县东之说，并考证出，汉射阳故城在今宝应县治东七十里的射阳镇，这是正确的。

关于东阳县的东境，刘氏认为，汉代和西晋时的东阳县，其东北境在扬州府宝应县境，指出：“或以长洲泽、吴王濞太仓、麋、扶海洲皆在东阳，非！”这是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的脱误。后汉广陵郡辖广陵、海陵、江都、高邮、平安、东阳、射阳、盐渎等十一县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广陵郡条下载：

东阳故属临淮，有长洲泽，吴王濞太仓在此。梁·刘昭注补曰：“县多麋。《博物记》曰：‘千千为群，掘食草根，其处成泥，名曰麋。’民人随此种稻，不耕而获。

其收百倍。’又扶海洲上有草名𦵏，其实食之如大麦，从七月稔熟，民敛获至冬乃讫，名曰自然谷，或曰禹余粮”。

刘宝楠指出：《潜邱札记》以长洲泽属盱眙，乾隆《江南通志》以麋𦵏属天长，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以长洲泽、吴太仓属天长，又以长洲泽、扶海洲附见于泰州而不敢决，皆误读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故也。刘氏认为，长洲泽、吴王濞太仓、麋𦵏、扶海洲均在海陵县，而不在东阳县，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“有长洲泽”之上脱去“海陵故属临淮”六字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广陵郡有东阳县而无海陵县，后来一般方志都以为后汉省海陵入东阳。按东阳县前汉属临淮郡，故城在天长县东南七十里，位于今扬州西北。海陵县即今泰州，在扬州之东，东阳、海陵之间隔有广陵、江都、舆县等县，两县并不接境，而距离较远，没有合并的可能。吴王濞的太仓，按《汉书·枚乘传》：“转粟西乡，陆行不绝，水行满河，不如海陵之仓。”〔原注〕臣瓚曰：海陵县名也，有吴太仓。证实太仓在海陵无疑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泰州条云：“麋𦵏，博物志云海陵县多麋，千万为群，掘食草根，其处成泥，名曰麋𦵏。民随而种，不耕而获，其利所收百倍。”这条引文和群国志东阳县的注文基本相同，出处都是《博物记》，所不同的是寰宇记明确海陵县多麋，而郡国志注则列于东阳县下。海陵在海滨，东阳在淮侧。麋鹿俗名四不象，是一种“水泽之交”的动物。汉代海陵县东境当长江入海处。在今南通、海安、泰州等地近几年出土大量麋角骨化石，是“海陵县多麋”的实物佐证。显然，郡国志所谓“县多麋”的县是海陵而不是

东阳。史料证实，后汉广陵郡确有海陵县，三国之际兵乱县才荒废。可以证明郡国志以海陵县的纪事列于东阳县下是有问题的。肯定原文有错乱的地方，明确了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东阳县注文为海陵县纪事，那么，扶海洲应在海陵县境可以肯定无疑。根据陈金洲的研究^④，扶海洲当是如东古沙洲。如东地区位于长江北岸古沙嘴的东部，为长江口最早出现的沙洲。汉时为海陵县东境，扶海洲就在这里。

历史地名是历史地理学的一组成部分。刘宝楠对“八浅”地名的考证，纠正了《明史》一字之误。《明史·王廷瞻传》云：“宝应汎光湖堤蓄水济运，平江伯陈瑄所筑也。下流无所泄，决为八浅，汇成巨潭，诸盐场皆没。”刘氏曰：“《明实录》、《行水金鉴》等书亦云决为八浅，其实八浅乃地名，句不可解。岂因堤决而湖之浅有八处，亦岂决于八浅之误与！”又曰：“国初沿河一带分置浅铺，每浅浅老一人，浅夫数十人，浅船四只，盖今日事撈浚，俾无壅阏，此置浅命名意也。”宝应运河沿线置有九个浅铺，分称一浅至九浅。康熙《宝应县志》载：“一浅曰子嬰浅，二浅曰汜水浅，三浅曰瓦甸浅，四浅曰槐楼浅，五浅曰白田浅，六浅曰潭湾浅，七浅曰七里沟浅，八浅曰白马浅，离城十里，南接五里铺，北至越潭中，九浅曰黄浦浅。”《扬州水道记》云：“隆庆三年，高堰大溃，决黄浦，八浅湖堤十五处，……宝应县之西十余里有白马湖，其当湖心而东即所谓八浅堤也。”由上所述，“八浅”是一地名，是由浅铺得名之地名。今日八浅为一小村镇，位于宝应城北十里，大运河东侧。笔者曾去考察过，《明史》上“决为八浅”显然有误，运河在八浅

决堤，只能说“决于八浅”。笔者对刘氏之说深表赞同。

关于清代扬州学派的著作，笔者仅是初次接触，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，扬州学派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作出不少贡献的，他们的学术思想，值得我们认真地挖掘。

参 考 文 献

- ①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见复旦大学出版社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，1985年
- ② 张舜徽：《清代扬州学记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2年
- ③ 汪 中：《述学》别录《与巡抚毕侍郎书》
- ④ 萧 统：《文选》
- ⑤ 王 充：《论衡·书虚篇》
- ⑥ 汪 中：《述学》内篇三《广陵曲江证》
- ⑦ 《嘉庆重修扬州府志》卷五，江都县
- ⑧ 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百二十三
- ⑨⑩ 焦循：《雕菰集》卷十三《上郡守伊公书》
- ⑪ 焦 循：《雕菰集》卷十三《复姚秋农先生书》
- ⑫ 焦 循：《北湖小志》卷一《叙水上第一》
- ⑬ 周魁一：《石碣源流考》，见《淮河水利史论文集》，1987年
- ⑭ 陈金渊：《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探索》，见《历史地理》第三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